

Xuzhou Handai

Shike Huaxiang Zaoxing Yishu

徐州汉代 石刻画像造型艺术

李 芬 ○ 著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徐州汉代石刻画像造型艺术

李 芬 著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在分析徐州汉代石刻画像造型艺术形成的社会因素以及同时代其他相关造型艺术的基础上,对徐州汉代石刻画像的造型进行了分类,对造型、基本造型线、外轮廓线条和内部装饰线条进行了探讨,分析了汉代石刻画像造型的创作原始动机、造型观以及时间、空间造型表达形式和表现技法,最后就徐州地区典型的汉画像石墓祠以及徐州汉画像石衰落的背景、原因进行了阐述,并提出了深入研究的方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徐州汉代石刻画像造型艺术 / 李芬著. —徐州: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2018.11

ISBN 978 - 7 - 5646 - 4260 - 0

I. ①徐… II. ①李… III. ①画像石—研究—徐州—
汉代 IV. ①K879.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277556号

书 名 徐州汉代石刻画像造型艺术

著 者 李 芬

责任编辑 何 戈

出版发行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省徐州市解放南路 邮编 221008)

营销热线 (0516)83884103 83885105

出版服务 (0516)83995789 83884920

网 址 <http://www.cumtp.com> E-mail: cumtpvip@cumtp.com

印 刷 徐州中矿大印发科技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张 10.5 字数 20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80 元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前 言

在汉代艺术中,石刻画像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汉代石刻画像
是两汉艺术最重要的实物遗存之一,也是汉代造型艺术的精华
所在。

汉代石刻画像艺术成就巨大,在中国美术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
作用,对汉代以后的造型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中国美术史上
的一座丰碑。

作为经济发达的黄淮下游地区、刘邦的桑梓故里,富庶的经济
和大量新兴豪门大族地主阶层的崛起,以及追求长生不老等神仙之
说的盛行,造就了汉代徐州地区用画像石营造的墓室、祠堂等建筑
物的兴盛,也形成了独具特点的徐州汉代石刻画像造型。

本书共分七个部分:第一部分简单叙述了研究的目的、意义、内
容、方法及现状;第二部分分析了徐州汉代石刻画像造型艺术兴盛
的背景以及同时代其他相关造型艺术成就;第三部分运用图像学
的方法对徐州汉代石刻画像的造型进行了分类,阐释了造型的意义,
提出了符合徐州汉代石刻画像自身特点的分类方法;第四部分对汉
代石刻画像基本的线造型元素进行探究,分析了徐州汉代石刻画像
造型的外轮廓线条和内部的装饰线条;第五部分在对民间美术和汉
代石刻画像创作主体同源性论述的基础上,以民间美术的造型观念
为切入点,深入分析了汉代石刻画像造型的创作原始动机、造型观
以及时间、空间的造型表达形式;第六部分介绍了徐州典型的石刻

画像墓祠,并分析了徐州汉代石刻画像衰落的原因;第七部分对本书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深入研究的方向。

本书通过对徐州汉代石刻画像造型的研究,对造型进行了分类和解读,并以分析现存民间美术形态为突破口,进行汉代石刻画像时空造型的探讨,进一步地挖掘汉民族的深层次视觉审美意识原型。徐州汉代石刻画像造型所体现的独特视觉审美,无疑也将为当代造型艺术的发展提供取之不尽的创作母源。

本书由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李芬撰写。在本书撰写过程中,参考借鉴了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谨在此对各类文献的原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的撰写与出版,得到了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2014SJB419)的经费支持。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或有许多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著者

2018年7月

目 录

1	引言	1
1.1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1
1.2	研究的现状	2
1.3	研究的内容与方法	3
1.4	相关概念界定	4
2	徐州汉画像兴盛的背景	7
2.1	政治背景	10
2.2	经济背景	14
2.3	文化背景	16
2.4	造型艺术	19
3	汉画像造型分类与意义阐释	28
3.1	汉画像造型分类的方法	28
3.2	汉画像造型意义阐释	32
4	汉画像造型的线	104
4.1	作为造型元素的线	104
4.2	作为造型表现的线	106
5	汉画像的时空造型及表现技法	112
5.1	以空间为基准的时间表现	113
5.2	以时间为基准的空间表现	124
5.3	汉画像的表现技法	137

6 徐州典型石刻画像墓祠	146
6.1 典型汉代石刻画像墓祠	146
6.2 徐州汉代石刻画像的衰落	155
7 结语	158
参考文献	161

1 引言

1.1 研究的目的是意义

汉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而这种地位更显著地体现在汉画像艺术上^[1]。鲁迅先生赞誉“唯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汉画像的图案,美妙绝伦”^[2]。汉代石刻画像艺术成就巨大,在中国美术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对汉代以后的造型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中国美术史上的一座丰碑,是一部精深博大的史诗^[3]。徐州是中国汉代石刻画像最重要的集中分布地之一,目前徐州保存汉画像石共1500余块。作为经济发达的黄淮下游地区、刘邦的桑梓故里与汉代富庶的经济成就了大量新兴的豪门大族和地主阶层,再加上追求长生不老等神仙之说盛行,造就了徐州地区用画像石营造的墓室、祠堂等建筑物的兴盛,也形成了完整的徐州汉代石刻画像造型系统。徐州汉代石刻画像构图饱满、造型生动,具有区别于其他地区的视觉造型特征。徐州汉代石刻画像现阶段的研究学界取得了很大成绩,艺术学方面多从艺术史、艺术精神、文化价值等进行研究。对徐州汉代石刻画像视觉造型展开研究,形成适合徐州汉代石刻画像分类的方法,并进一步分析创作者的原始创作动机、思维结构、表现方法等,对挖掘汉民族的视觉造型审美本源,深入理解中国传统造型观、符号观,进行现代造型设计,有着不可忽视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1.2 研究的现状

汉代石刻画像研究成果可谓丰厚。信立祥先生在其著作《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中,对汉代石刻画像的发现与研究总结划分了三个阶段,即北宋末年到20世纪初的金石学研究阶段;20世纪初到20世纪60年代用近代考古学方法积累汉代石刻画像资料的研究阶段;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汉代石刻画像综合研究阶段。王建中先生在其著作《汉代画像石通论》中对汉代画像石的研究分为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汉代石刻画像的著录、唐宋时期汉画像著录、清代汉代石刻画像著录、民国汉代石刻画像著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汉代石刻画像的研究及保护等五个部分,对汉代石刻画像的研究史进行了记载。更有常任侠先生、李法林先生、顾森先生等在著作中对汉代石刻画像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叙述。综其所述,汉代石刻画像研究在我国历史、文化、考古、美术、科技等方面均有丰硕的成果,自清代至今所发表的画像石研究方面的发掘报告、论述、考释文章有1600多篇,出版研究画像石的专著60多部,出版画像图录80多册,下面仅就与本书相关的研究进行简要的归纳。

(1) 以图集形式出现,冠以简短序言,扼要说明画像内容的有:傅惜华《汉代画像全集》(1950)、王子云《中国古代石刻画像选集》(1957)、赵无极《汉拓》(1976)、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徐州汉画像石》(1959)、徐州博物馆《徐州汉画像石》(1985)、《徐州汉画像石》编委会《徐州汉画像石》(1995)、武利华《徐州汉画像石》(2004)、汤池《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画像石全集·江苏、安徽、浙江汉画像石》(2000)等。

(2) 对汉代石刻画像做综合性研究的有:日本的长广敏雄《汉代画像的研究》(1965),这也是最早的一部对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和墓室壁画进行综合比较的研究,其中有德国学者苦劳瓦森从透视学角度分析武梁祠画像特点的一篇文章,它也是汉代石刻画像研究新阶段的开始^[4];此外,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2000)、王建中《汉代画像石通论》(2001)都比较全面深入地

石刻画像进行了综合性研究。

(3) 对汉代石刻画像做专题图像研究的有:陈履生的《神画主神研究》(1987)对两对主神(西王母与东王公、伏羲与女娲)做了图像志的考察,并进行了比较研究;李淦《论汉代艺术中的西王母图像》(2000)运用了图像学的方法,对画像石、画像砖、铜镜、铜摇钱树、壁画、玉器、漆画等众多艺术实物中的西王母图像进行了系统研究。

(4) 从艺术思想史角度研究的有:巫鸿《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1989)开创了汉代石刻画像艺术史研究的新空间;顾森《秦汉绘画史》(2000)以“汉画像的遗存”来概括画像石、画像砖,又称其为“砖石艺术”,考虑到了汉代艺术样式的独特性^[5]。

汉代石刻画像研究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并对汉代石刻画像做了一定的文化阐释。以上研究,从方法到结论都对本研究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1.3 研究的内容与方法

应当说汉代画像研究的角度目前是多方面的,涉及汉代石刻画像的地域分布及分期、题材分类、图像考释、文化价值、象征意义等方面。汉代石刻画像现有的研究体系与研究方法可以归纳为金石学式的研究、考古学式的研究、文化学式的研究、艺术学式的研究等四种形式,这四种形式有些问题的研究在学术界已经得到公认,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

基于对汉代石刻画像研究历史与现状的认识,本书拟在徐州汉代石刻画像的视觉造型上做进一步的尝试。本研究主要由七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引言部分,重点说明研究的目的与意义、方法以及本研究领域目前的研究状况;第二部分主要是分析徐州汉代石刻画像造型艺术形成的社会因素以及同时代其他相关造型艺术;第三部分运用图像学的方法对徐州汉代石刻画像的造型进行了分类和意义阐释,并提出了符合徐州汉代石刻画像自身特点的分

类方法;第四部分对汉代石刻画像基本的造型线进行探讨,分析了徐州汉代石刻画像造型的外轮廓线条和内部的装饰线条;第五部分在论述现代民间美术和汉代石刻画像创作主体同源性的基础上,以民间美术的造型观念为切入点,深入分析了汉代石刻画像造型的创作原始动机、造型观以及时间、空间的造型表达形式和表现技法;第六部分分析了徐州地区典型的汉画像石墓祠以及徐州汉画像石衰落的背景、原因;第七部分为结语,总结了研究成果,并提出了深入研究的方向。

本研究具体的研究方法,是在对徐州汉代石刻画像的现场考察、分类总结、与徐州民间美术造型分析对比等基础上进行深入分析,立足于对汉代石刻画像石图像分类,根据图像的造型和与此相关的文献资料来分析图像的题材,通过对图像题材的阐释来指向图像的深层意义,同时对画像造型线进行分析,并通过对汉代石刻画像的时间表现方法、空间表现方法结合徐州民间美术造型来研究创作者的原始设计思维,进一步地总结归纳出汉民族设计审美风格的取向和深层次审美意识。

1.4 相关概念界定

在进行汉代石刻画像造型研究前,有必要对相关对象和研究区域进行界定。

1.4.1 对象的界定

汉画像是指两汉时期绘制在缣帛、粉壁、各种工艺品上以及刻制在砖石上的图像或纹饰,是对汉代不同物质和形式的材料表面绘制图像的概括,亦称为“汉画”。

它的侧重点在视觉图像的表现方法和接受方式上,因为只有这种方式才具有决定图像本源的意义^[4]。汉画像主要包括汉画像石、画像砖、壁画、漆画、帛画、陶器画、铜器画等图像。由于汉帛画、漆画等受时间影响易损坏,因此现

存世的汉画像以画像砖石图像为主。这尤其反映在徐州汉画像上,本书以汉代石刻画像为研究对象,其他汉画像徐州地区现存稀少,本书不再叙述。“画像”早为“画象”,可以溯源到汉代,它的含义为“象刑”,是一种象征意义的刑罚。《汉书·武帝纪》诏贤良曰:“朕闻昔在唐虞,画象而民不犯,……”颜师古注引《白虎通》曰:“五帝画象者,其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以赭其衣,犯髡者以墨蒙其髡处而画之,犯宫者履扉,犯大辟者布衣无领。”这也就是说舜帝贤明政治,虽有五刑,但不使用,以在犯者衣帽上画像以示惩罚,警戒他人。此外,“画像”的另一个意思是表示“图画其形象”。《后汉书·蔡邕传》:“允悔,欲止而不及,邕遂死狱中,年六十一,搢绅诸儒莫不流涕。……皆画象而颂焉。”《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州中论功未及上,会竦病创卒,张乔深痛惜之,乃刻石勒铭,图画其象。”以上可以看出至少在东汉时已有间接或直接的关于画像石的记载。而有现代意义的“画像”的概念,来源于宋代的金石学。

“画像”一词多见于《金石录》《隶释》《隶续》等著作中。造型一词源于德语 modellierung,原意是建模或做模拟像的意思。造型即创造物体的形象,又可释为占有—定空间构成的形象。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转引西晋陆机语说:“存形莫善于画。”南齐谢赫在《画品》中亦说:“应物象形。”有学者指出对汉代石刻画像的研究,应该针对原石的画像,拓片图像的研究是脱离其存在环境的肢解式研究,仅局限于对画像内容的考证,不可能对画像的质地、配置、用途以及雕刻技法等做科学的阐释。不容置疑,画像的多语义解读理应还原其“原有的真实”,但原石并不是完整意义的雕塑作品,观看受光线、角度等条件制约诸多,这种原石研究实质是脱离了图像的真实。从画像石拓片的产生来讲,包括了起稿上石、刻制、拓印三个环节,这个过程是从二维图像到三维图像再到二维图像的回归。镌刻所留的刀痕,石刻技法的稚气,拓印的金石感以及特有的线条感、肌理感已经和汉代石刻画像形成了共生体,创造了汉代石刻画像这种以石头为媒介,起于画又止于画的特有艺术特征,所以汉画像石拓片从一方面来说,是还原而又创造、升华了画像的真实。汉代石刻画像包含有形像、图像、图画、图形、纹样等意义在内,本研究重点在于画像呈现的视觉造型,并在汉画像石拓片与汉画像石的交互关系上来展开对汉代石刻画像造型艺术的解读。

1.4.2 区域的界定

清同治年间的《徐州府志》有徐州沛县发现汉代石刻画像的记载。民国年间,著名书法家张伯英先生(徐州人)收藏保存了一些汉代石刻画像,但这些都是零星发现的。科学的发掘工作,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952年以来,江苏省和徐州市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先后发掘了一批汉墓。

信立祥先生在《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中把汉代石刻画像分为五个区:河南南阳、鄂西北区;山东、苏北、皖北、豫东区;陕北、晋西北区;四川成都、重庆区;河南洛阳、郑州区。徐州与山东、皖北、豫东汉代石刻画像在区域分布上同属一区,被称之为苏鲁豫皖交汇区^[3]。徐州居苏、鲁、豫、皖四省要冲,向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徐州沛县是汉高祖刘邦的家乡,官员“多从其出”。已发现的汉代石刻画像以徐州沛县周围地区包括现鲁南、豫东、皖北、苏北最多,再加上上述地区汉时多属徐州刺史部(图 1-1),所以本书为了使徐州汉代石刻画像研究更为科学,在进行同类型画像分析时就必须站在广义的徐州区域上。



图 1-1 东汉徐州刺史部地图

2 徐州汉画像兴盛的背景

今天的徐州城古称彭城,早在 6 000 年前就有先民在此劳作。它有着 4 000 的年文明史,2 600 多年的建城史和 2 570 多年的文字记载历史,是江苏境内最早出现的城邑。传说它起源于唐尧时代的大彭国,夏禹治水时,把全国疆域分为九州,徐州为九州之一——当时“徐州”只是作为一个自然经济区域的名称,所谓“济东曰徐州”(《尔雅·释地》),“海、岱及淮惟徐州”(《尚书·禹贡》),大致应该是北到泰山,南抵淮河,东及大海的地域。相传夏商时,徐国在今宿迁建国。而彭城邑在春秋战国时期历属吕、宋、楚诸国,并成为这一区域的中心城市。秦时在此置彭城县。两汉先后为楚国、彭城国都城。东汉建安三年(198 年)后不久,曹操迁徐州刺史部于此,这是称彭城为徐州之始。两晋、南北朝、隋、唐及宋、元、明诸代,此地历为彭城郡治或徐州治。清雍正十一年(1733 年)升州为府,置铜山县取代彭城县,1912 年为铜山县治,1945 年 9 月置市,后逐渐形成今日徐州的规模。

徐州是两汉文化遗存最为集中和丰厚的地区之一,汉墓、汉画像石、汉兵马俑并称为徐州“汉代三绝”。两汉文化是徐州成为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主要因素,所以史学界有学者认为“明清看北京、先秦看西安、两汉看徐州”。徐州汉画像石,最早见于文献的是《后汉书·郡国志》注引东晋伏滔《北征记》一书中“……皆青石,隐起龟龙鳞凤之象”的记载。这里的“龟龙鳞凤”,是徐州汉画像石经常表现的内容。根据徐州地区目前已发现的几十座完整的汉画像石墓葬,就其形制、随葬品和带有纪年石刻题铭的画像石及雕刻技法进行分析,徐州地区汉画像石始于西汉末、东汉初,兴盛于东汉中期,结束于魏晋。从其发展的规律来看,其艺术风格既有继承又有创新、稳定中有渐变、多样而又统一。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嬴政统一中国,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大帝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对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由于秦代行政苛暴,阶级矛盾迅速激化,秦传至二世,即被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推翻。西汉初期的统治者鉴于秦王朝覆灭的教训,采取了轻徭薄赋政策,使社会经济获得恢复和发展。

西汉王朝建立后,政治上的高度统一,也形成了文化上的大一统。在汉代美术中,一种装饰图像、造型手法可以在全国同时出现、流行,反映到社会风俗上,表现为一种艺术形式风行天下。例如汉画像石艺术的形式与造型、技法等,在全国范围内表现为大的统一与小的地域差别共存。秦汉的经济政策加速了自春秋以来的土地私有化的进程。自西汉中期开始,“庄园经济”蓬勃发展。权贵富豪通过巧取豪夺兼并弱小者和农民的土地成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西汉中后期,官僚与宗族的关系逐步紧密,互相庇护,势力结合,使官僚拥有更广阔的社会背景和经济基础。到汉武帝,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实行国家垄断冶铁、煮盐、铸铁等行业的经济政策。社会生产和物质文化生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如铁制的兵器、农具、手工工具与牛耕得到普遍的推广和使用,冶铁的空前发展为画像的制作提供了物质基础^[6]。据气候学家竺可桢的研究,汉代徐州的气候比现在温暖湿润。西汉至东汉初,我国气候处在五千年来第二个温暖期内。徐州地势平坦,海拔很低,原野上沼泽湖泊星罗棋布,泗水(又名清水)是汉代徐州地区最重要的干流,徐州的河流均属泗水水系。泗水的支流众多,从北向南依次为丰、泗、沂、沐、沔五水。直至北魏,徐州一带仍然是“水陆壤沃,清、沔通流,足盈激灌,其中良田十万余顷”^[7]。自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 年)至清朝咸丰五年(1855 年)七百余年间,黄河南徙,占据徐州以南的泗水河道,夺淮入海,成为地上河,黄河南徙使泗水水系遭到严重的破坏,原来的灌溉和排涝功能丧失,淮河也因泄水不畅变为害河。受黄淮威胁,徐州地区水旱频繁,十年九灾。从水系变迁看,汉代是徐州水利最好的时期。

汉代徐州民风重农,在《史记》《汉书》中,徐州属宋、鲁分野。《汉书·地理志》曰:“鲁地……南有泗水,至淮,得临淮之下相、睢陵、僮、取虑,皆鲁分也。……地狭民众,颇有桑麻之业,亡林泽之饶。”泗水以东及其下游的徐州都在这一范围内。又言宋地:“……其民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穡,恶衣食,

以至畜藏。”可见汉代徐州的重农风俗^[4]。史家在《三国志·陶谦传》中载：“徐州百姓殷盛”“谷米封赡”。此外，汉代徐州有发达的冶铁业，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在全国设铁官 49 处，仅徐州境内就有 3 处：彭城、沛、下邳^[8]。1954 年，铜山县发现利国驿汉代冶铁遗址，范围较大。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人口的激增，东汉时期，彭城国人口已达 50 万，这是清代以前徐州人口的最高纪录。《史记·货殖列传》载，这里“地小人众”。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加上统一的社会环境，物质、文化方面充分发展，使得自西汉以来徐州地区具有营造石室墓能力的社会阶层成长壮大起来，为汉画像石墓葬的兴起提供了经济基础。至东汉时期，土地兼并逐步加剧，豪强地主兼营商业，富商大贾兼并土地，形成了以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封建豪强经济。而最大的一批豪强地主自然是皇帝的内亲外戚，尤其是诸封王，这种现象在作为帝乡的徐州则更为明显。顾祖禹 300 多年前写道：“（徐）州冈峦环合，汴泗交流，北走齐鲁，西通梁宋，自昔要害地也。”两汉共十八代诸侯王及其荫封的子孙在这里留下诸多规模巨大的坟墓。

在经济发达的黄淮下游徐州地区，同时也作为刘邦的桑梓故里，汉代设立了许多王侯封国，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豪门大族，以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地主经济得到蓬勃发展。富庶的经济和新兴的豪门大族地主阶层，为徐州地区汉代石刻画像的兴盛发展创造了社会条件。

汉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经过几十年“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过渡，汉代社会经济取得了全面的繁荣。据《汉书·食货志》载：“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廩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这说明推行“无为而治”对扭转汉初凋敝的社会状况卓有成效。然而它所提倡的“好清静……不细苛，治务在无为而已，引大体，不拘文法”的思想却削弱了中央的权力。黄老哲学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秩序的需要。至汉武帝时期，武帝刘彻雄才大略，眼光自然不能满足于“无为而治”所带来的表面繁荣。改变黄老“无为而治”的政策，巩固和强化中央集权政体，成为汉武帝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当时的社会现实使刘彻意识到，要改变所面临的矛盾，实现经济的全面繁荣，必须重新建构一个社会秩序。汉代儒家正是抓住这

一契机——经过改造的,杂糅道、法、阴阳五行的儒家新学说,逐渐取代了道家思想的主流地位,由此走上了历史前台,成为汉代及后世封建统治的主要指导思想。

此外儒家学说为汉代厚葬风俗的出现和盛行提供了思想和礼制的依据。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学说在社会政治、思想中逐步占据了统治地位。儒家所提倡的以孝为仁之本的思想和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规范,适应了汉代大土地所有制的迅速发展的经济基础,满足了为巩固这种封建家族关系和社会统治秩序的需要。而孝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对父母等先人奉行厚葬,因而人们以厚葬为尽孝的表现。从西汉中期至东汉末,社会上出现“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的现象。此外汉代人的心理和实践活动深受阴阳五行观念的影响,阴阳五行观念是汉代思想的骨干。徐州地区汉代神仙方术盛行,是早期道教流行之地,追求长生不老等神仙之说盛行。徐州地区自战国后期即为楚国疆域,受楚文化影响,好巫尚鬼之风盛行。这些都对徐州地区汉代石刻画像的发展产生影响,并为之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思想素材。也就在这种社会风气之中,徐州地区用画像石营造的墓室、祠堂等建筑物得以发展兴盛起来。

所以,徐州地区汉代石刻画像既是汉代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的产物,也是汉代经济关系、阶级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汉代社会思想意识形态和社会风气的产物。

2.1 政治背景

徐州地区汉代石刻画像的产生背景、表现内容以及所反映的艺术精神无不与当时汉代政治氛围有很大的关系,政治环境的递变,是汉画像精神嬗变的背景内容之一。

2.1.1 西汉政治的发展

西汉建立初期,民生凋零,社会动荡不安,经济时起时落,因此,统治者汲